

专题论文: 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

Feature Articles: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1960年代马来文学与 马华文学的后殖民话语*

The Postcolonialism Discourse in Malaysian Mala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1960s

黄丽丽

(WONG Lih Lih)

摘要

“后殖民文学”并不是仅仅指帝国之后才到来的文学,而是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考察的文学。早在1930年代的英殖民政府管辖时期,马华新兴文学以及马来左翼文学已有不少反殖主题。直至独立前后,不少作家仍然致力于反思殖民主义,包括本土对待殖民者的态度、殖民体制内的权利关系以及殖民者留下的历史伤痕等议题。关于马来与马华文坛的反殖文学已有不少论述,但却鲜少论及各个民族的文学叙事如何共同结构马来(西)亚的后殖民话语,抑或检视现有的文本是否具备跨越性的反思?文学史一般以“分而治之”的方法处理这一课题(各语种的文学史分别论述自身的后殖民文学),本文试图突破这一局限,重点考察1960年代马来以及马华的后殖民小说,将两个族群不同语种的作品放置于国家独立前后的历史脉络中对比参照。

关键词: 殖民、马来文学、马华文学、话语

* 本文依据提呈华社研究中心举办的“1950、60年代马来亚、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三地的知识连接与纽带关系”工作坊(21.5.2017)论文修订而成。感谢讲评人张惠思老师以及匿名评审所提意见。

黄丽丽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E-mail: lihlihw@gmail.com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7

Abstract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does not only refer to literature that came after the empire, but refers to the literature that makes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colonial relations. As early as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s jurisdiction in the 1930s, there have been many anti-colonization themes in Malayan Chinese and Malay Left Wing Literature. Until and after independence, many writers were still committed to rethinking the colonialism. They concerned about the attitudes of local people toward colonialists, th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olonial system, and the historical trauma left by the colonists. There has been much discussion about the anti-colonial literature in both Malay and Chinese literary platform. However, it has rarely been discussed how the literary narratives of various ethnic commonly construct the Malaya/Malaysia postcolonial discourse. Generally, each language discusses its ow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eparatel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roaden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and focuses on the postcolonial fictions of Malay and Chinese in the 1960s. The literary work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were plac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between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Keywords: colonial, Malaysian Malay literatur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discourse

一、前言

马来西亚各民族虽然享有共同的生活经验与历史记忆，例如殖民时期的经历、争取独立的过程、独立后的建国历程等，然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异常匮乏。这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种族关系问题，也是殖民者长期对于各族群进行分而治之所产生的分化结果。

早在1930年代的英殖民政府管辖时期，马华新兴文学以及马来左翼文学已有不少反殖主题。直至1957年独立前后，不少作家仍然致力于反思殖民主义，包括本土对待殖民者的态度、殖民体制内的权利关系以及殖民者留下的历史伤痕等议题。关于马华与马来文坛的反殖文学已有不少论述，但却鲜少论及各个民族的文学叙事如何共同结构马来（西）亚的后殖民话语，抑或检视现有的文本是否具备跨越性（例如跨族、跨语言、跨文化）的反思？文学史一般以“分而治之”的方法处理这一课题（各语种的文学

史分别论述自身的后殖民文学)，本文试图突破这一局限，重点考察1960年代马来以及马华的后殖民小说，将两个族群不同语种的作品放置于国家独立前后的历史脉络中对比参照。

本文在论述“后殖民文学”时，主要借用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postcolonial literature”¹的概念，它并不是仅仅指帝国“之后才来到”的文学，而是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的考察的文学（艾勒克·博埃默1998：3）。

二、创伤记忆中的后殖民反思

殖民策略不仅带来物质与经济上的损失，还有身心灵的创痛。这些创伤记忆，需要文学记取与梳理。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认为记忆是殖民主义与文化身份问题之间的桥梁。记忆（memory）绝不是静态的内省或回溯行为，它是一个痛苦的组合（remembering）或再次成为成员的过程，是把被肢解的过去（dismembered past）组合起来以便理解今天的创伤（转引陶东风2002：117）。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的小说《遍地枯骨》（*Tulang-tulang Berserelakan*）（1962）或许就是这类创作。

《遍地枯骨》跟伊斯迈·佐哈里（Ismail Johari）1999年出版的《武吉哈逢》（*Bukit Kepong*）一样叙述受薪于英殖民政府的警员在紧急状态期间的故事。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不同于佐哈里简化的二元叙事模式。小说通过主人公乐曼（Leman）讲述一群马来青年在警校结业后被派驻马六甲执行反共行动。期间，乐曼经历了警员和丛林战队（jungle squad）的艰苦生活，也见证了紧急状态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这是一部充满反思精神的伤痕文学，文本寄托了作家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借着主人公对同僚之死的反思与质问，质疑了殖民主义的权威：“作为一名（受雇于殖民政府的）警员，忠诚于规则与命令还不足够，还需为此献上自己的生命！”作家最终将问题引向身份认同的思考。在执行剿灭马共的过程中，主人公看到了许多遭遇殖民的伤残躯体/死亡

遗体，让他重新省思殖民体制中的权力规约。他意识到自己与殖民主义的共谋关系，并且领悟到自己与祖国的关系，因此决定离开警队。主人公在从军生活中，深感“生命日复一日在死亡、毁坏、心碎中渡过，化作历史的枯骨，随之被覆盖以美丽或崇高的语言以便安抚人心。”那“美丽或崇高的语言”正是殖民者打着正义之名的虚假幌子，以便殖民地子民能为殖民者的地位与利益赴义。

小说主人公在多次的剿灭马共行动中，开始意识到，他帮助殖民宗主（英国人）去打压马共毫无意义，所以他敢于称赞敌人，并形容他们的斗争为“钢铁般”的意志。叙事者对于马共牺牲自己原来的生活而投奔山林的举动，亦充满着同情。尽管小说叙事者有别于作家本人，但我们仍可就此探究作家的态度价值取向。事实上，主人公乐曼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作家本人的代理人。现实中，乌斯曼·阿旺在日本投降后，为了养家活口曾加入警察部队，在部队服务期间（1946-1951），他见证了殖民地时代各族人民的痛苦：

在进入森林与共产党对抗时，我看到很多华裔农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为了防止农民协助共产党，把他们的农舍烧掉。我本身经历过真正的贫穷，了解他们的痛楚。

（转引周伟氏、唐玲玲1996：5）

作家也坦诚自己在警队服务期间奉行了无理的逮捕行动（Dinsman 1995：xv）。热爱和平的作家眼见这些乱象，最终决定离开警队，执笔为生。小说中，殉职的同伴、失去孩子的母亲、重伤同僚的家属以及过着艰苦生活的共产党员，让主人公不断反思生存的问题：两方人同样面对死亡，差别在于一方是为了糊口而受薪于人，与死亡对抗；另一方则为了信念与所追逐的理想（Usman Awang 1996：220）。

主人公并不去评价两个阵营的对错得失，他清楚看到两方有各自的立场。他更关心的是这场斗争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的影响与伤害。乌斯曼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再现了独立前紧急状态时期的社会局面，尽管身为警员的主人公被卷入两股政治势力的对抗之中，但他却能够跳脱笼罩其中

的意识形态，而从“第三方”的视角审视个体自我与两种“他者”（马共与英殖民）之间的关系。主人公虽然被赋予剿灭马共的任务，但从个体角度出发，马共并非其死敌；另一方面，他（们）与殖民政府的关系也并非理念一致的伙伴，而是强势他者与弱势自我的关系。殖民者行使他们的权力，利用受薪的警员对付构成威胁的马共，以便维护自身利益。简单来说，他们只是殖民他者的棋子，或者文中马共成员所讥讽的“猎犬”。

作家立于两种他者的历史意识之间，在被动选择的同时，不忘以自身立场来表达自己的历史意识以及独立思考，实属可贵。然而，马来学者 Dr. Talib Samat 将这部小说纳入马来反共小说的脉络中讨论（Talib Samat 20.12.2009），显见他只是依主人公的工作职责（剿共）而作出判断，但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思想以及精神追求，不以整体来把握小说内容。如果这并非错误判断，便是论者刻意歪曲小说的主题思想。主人公乐曼从一开始加入警队的懵懂青年，到接触政治以后被唤起的社会觉醒，经历了队友的惨重伤亡使他再度反思，最终不愿成为殖民者的奴隶而离开警队。这部小说不仅不是一部反共小说，而且还可以回应那些指责马共在抗英斗争中是恐怖分子的说法。在这方面，乌斯曼的马来族身份以及并非马共成员的立场，促使其叙事更具备说服力。

乌斯曼·阿旺于1962年分别写了同名的小说和诗歌《遍地枯骨》，两篇文本都以“遍地枯骨”的意象反映历史创伤，而马共在殖民的背景下其实也是受害者。作家在诗歌中写道：

我们和他们一同
挖掘 再从遍地枯骨中
堆叠骨架……

（Usman Awang 1999：98）

跟小说一样，“我们”是受薪于英国人的警员，而“他们”则是马共，立场上他们应是敌对的关系，然而现实中他们却共同结构了“被殖民”的悲惨命运。再者，他们的敌对关系之始作俑者也是英殖民者。作家这两个文本的创作也许是受到印度尼西亚“四五世代作家”文学团体

(Angkatan 45) 最重要的诗人凯力·安华 (Chairil Anwar) 的影响。后者写于1948年的反殖诗歌“Karawang-Bekasi”就出现了不少“枯骨”意象。根据印尼文学批评家H. B. Jassin对Chairil Anwar的手稿及藏书的研究, 此诗原改写自美国诗人Archibald Mac Leish (1892-1983) 的诗作“The Young Dead Soldiers” (《英年早逝的士兵们》)。由此看来, 乌斯曼也间接参与或回应了世界文学中反殖/反战的主题。

与乌斯曼·阿旺一样具备浓厚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是A.沙末·赛益 (A. Samad Said), 两人皆为“五十年代作家行列”²之重要成员。沙末·赛益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疲惫的河流》(Sungai Mengalir Lesu) 透过民间生活场景来展示历史的叙事模式, 摒除了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 的视角, 反而以个人经历与心理历程反映时代变化对人的作用。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对战争底下民间日常生活的刻画。他将战争记忆的主体聚焦于普通百姓, 以此突显记忆的集体性, 譬如警报来的时候, 不管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锡克人都一起逃到避难所 (shelter) 避难。

小说中流经村庄的河流, 是历史河流的象征, 它见证了各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对这片土地的戮害。先是日军押着英军战俘从河边走过去, 然后又到日军战败, 英军重返, 押着日军败将在路上走。这条河流也充满着生死意蕴, 有不少尸体沉入河底, 有被日军打死的、有病死、自杀的。这条河虽然埋葬生命, 象征死亡, 但同一时间却也维持了生命的延续, 河里漂流的腐坏食物、瓶子、轮胎等在战争时期物资匮乏的情况下, 却是可贵的生活资源。

沙末·赛益一直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 在《疲惫的河流》中, 他借着小人物的各种悲哀控诉战争的毁灭性。当一对历经苦难的难兄难弟互相扶持在墓园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当年轻女性为了获得食物, 让自己和家人继续生存而被迫以躯体跟殖民/侵略者进行交换时, 读者不会不感到悲哀与愤怒。当伊万看到成群的苍蝇争食好友穆亚迪的尸体时, 他不禁寻思: 在战争时期, 苍蝇靠着吃人而活! (A. Samad Said 1997: 143) 战争的破坏性真是叫人情何以堪!

小说似乎没有特别突显某个人物作为主角, 而是相当平均地叙述了

几组人物的悲喜。作家也没有强调哪个人物是哪一种族，读者只能从人物名字获得有关信息。作家尤其关注苦难之下的女性命运，描绘她们的生存境遇，例如杜米娜与萨莉玛为了获得食物，必需用自己的身体与日军进行交换；17岁的仄伊娜因家境贫困被迫卖给阿尤布这个52岁的印度老人当妻子，阿尤布的占有欲使仄伊娜的生活如囚徒，甚至每次跑警报时，仍被反锁在屋里，最后被活活炸死。小说因而透露着浓厚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色彩。

在1960年代以后，随着多个民族争取回来的国家独立，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暂时得到纾解。这时期当马来作家写作殖民题材的作品时，已经能够将华族和印度族等族群予以平等看待，在立场上，他们同样处于殖民者的对立面。

三、本土化的左翼马华

回顾1960年代的马华文坛，充斥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超越意识形态、跨越族群文化的后殖民书写并不多见。不过，左翼文学方面，有一位作家值得关注。从现有已经“出土”的马共书写看来，金枝芒是作品数量最多且最有写作能力的马共军中作家。1948年，金枝芒以“周力”之名参加抗英武装斗争，在部队里负起编辑和文教宣传工作，因此有不少作品发表于军中文艺刊物。金枝芒的两部长篇小说《饥饿》和《烽火牙拉顶》便是该时期作品。前者曾于1959年抄和1960年出版手抄油印本，后者则是在他遗物中发现的文稿，有30多万字，改写自抗英战争小说《烽火中的牙拉顶》，但并未完成。这几部小说由前马共成员搜集整理后由21世纪出版社于2000年以后正式出版，始进入大众眼界。

金枝芒另外三个中篇小说《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顶》和《甘榜勿隆》大约完成于1958-1959年间，并由党军出版，2004年才由方山编入《人民文学家金枝芒抗英战争小说选》。故事中的马共人物，正是上述小说《遍地枯骨》与《武吉哈逢》中英殖民者及其雇用的马来士兵或警员欲剿灭的敌人。由他们现身说法来叙述故事，又会如何自我

定位，并且处理自身与马来亚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

方山在介绍这部小说选时认为作品反映的是阿沙族、华族和马来族群众在英殖民主义者强加的战争中遭受的凌辱、苦难和杀害，以及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和献身（金枝芒2004：11）。阿沙族指的是原住民，即“orang asal”或“orang asli”。从小说题目来看，第一篇小说便以原住民领袖督央央为题，写抗英的解放军在生活上做到与原住民打成一片，并培养原住民青年办事，老江最后还解救了被困于集中营的原住民。在此，殖民者的暴力恰好成了团结本土居民的一个契机，小说结尾处有以下的情节与对话：

老江说：“现在郎外（解放军）与阿沙是一条命，也一条心了。”

督央央说：“森林是阿沙的家，也是郎外的家了。”

……

老江说：“郎外和阿沙一起在森林里，就好像鱼在水里了。”

（金枝芒2004：74-75）

在《甘榜勿隆》中，作家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写马共成员如何走入乡区和甘榜，接洽与招纳当地居民。居民的反应一般是从恐惧到了解、信任，续而接纳甚至爱戴。在甘榜勿隆，居民最后被马共成员的真诚与牺牲所打动，在割禾季节之前提前把熟了的稻穗割下让马共作路上的粮食。在动员马来民众加入马共时，马共队长深明“要真正赢得他们的心，还要靠以后的真正为他们的福利、真正保护了他们的实际行动。”（金枝芒2004：214）庄华兴认为金枝芒为了贯彻个人理念，他敢于跨界进入马来人的生活领域，进行描绘与概括，诚为一名积极的实践主义者（庄华兴9.8.2005）。二战以后，金枝芒先后担任多家报馆的编辑。他对马来亚政治的介入与观察，促使他从本土关怀的角度来思考殖民与家国的的问题，其作品也展示了中国南来作家如何从南洋历史语境出发，抒发革命情感与家国意识。

金枝芒的长篇小说《饥饿》则是相对成熟之作。小说近40万字，副标

题为“抗英民族解放战争长篇小说”，讲述由老刘率领的抗英革命小队与组织失去联系，被隔离在偏远山区，在英殖民的严厉封锁与叛徒出卖后，十几人在缺粮情况下坚持斗争，最后只剩五位战士突破重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学，这种英雄主义的形象塑造是意料中的文本策略，况且金枝芒作为部队的文教宣传工作者，他创作的内容、形式、目的和读者对象早有预设。然而，《饥饿》这部小说的可贵在于它不仅符合了作为一种功能文学（functional literature）的要求，在服膺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余，仍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在人物形象上，这群抗英战士，他们的形象是复杂的，他们是革命战士，凡人与受难者的矛盾结合。小说中这支队伍，并非马来反共小说中经常以凶狠残暴形象出现的士兵，反而是一支“老弱病残孕”（有女游击队员为孕妇）。这批人除了要与敌人厮杀，还需时刻与大自然搏斗，而饥饿的问题更是考验生存与人性的关键。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革命斗士也曾因艰苦的感觉而哀叹或落泪。通过这些人物，我们不仅看到“高、大、全”的革命英雄，还看到了人物回归日常的世俗人性。

值得关注的是，作家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也使他在行文中不自觉地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饥饿》充满了饥饿、病痛、伤残和死亡的非常态叙事。文本中人物的相继死亡，或因战斗牺牲、或因饥饿、疾病离世（包括在饥饿中以野生植物充饥而中毒身亡）、或逃离中遭遇意外，甚至还有非自然的死亡（因避免暴露行踪而将初生婴儿弄死），使作品充满着悲剧感，是作家的革命话语所掩盖不了的悲剧性。黄锦树认为小说中大量的死亡细节描写，就量而言应已超过宣传的需求，而带着（残酷的）审美趣味，为马华文学留下罕见鲜明的死亡面容（黄锦树14.3.2010）。

金枝芒的作品的重要性，除了是马共内部作家“自我形塑”的重要文本，也为马华文学提供了反抗殖民的另一种左翼书写方式。

四、后殖民的国族寓言

高嘉谦曾指出文学的族群写作问题不仅在于暴露或想像的解决个体与

群体的矛盾。更直接的说法，寓言体的族群书写鼓励了读者重新体验文本中没有解决的社会与政治矛盾。那是历史伤痕的局部，却也是生存情境中结构性的压迫（高嘉谦2007：352）。在马来文坛，曾出现过一部类似于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动物庄园》（*Animal Farm*）的政治寓言小说，这部小说名为《圣鼠》（*Tikus Rahmat*），由马来作家哈山·伊布拉欣（Hassan Ibrahim）于1963年所作。

小说描写一个名为“和谐乡村”的偏远地方，一众鼠辈因人类的灭鼠行动而面对灾难。恐慌之际遂举办群鼠大会，一只能言善辩的白老鼠呼吁大家联合起来反抗人类，在众志成城之下人类的农作物尽遭摧毁，人类只好带着猫狗离开。群鼠胜利以后，那只作为领头的白老鼠便宣告鼠群的独立，同时封自己为“圣鼠”（*Tikus Rahmat*），进而建立民主选举制的“老鼠联合邦”。“圣鼠”还建立了国会、制定政治中心以及鼠国的国家原则。当然，这些原则只有在“原则上”给予子民平等的权力，实质上却给予某些鼠类特权。例如当中两个原则为“每只鼠可以自由信仰，但是白老鼠的宗教信仰被尊崇”以及“每只鼠有发言与行动的自由，但是他们没有权利作出与白老鼠对立的言行”（Hassan Ibrahim 2001：15-16）。

白鼠的种种策略皆体现了去殖民之后的“后殖民焦虑”。这是一种对殖民宗主欲舍难割的暧昧情结，一种从殖民主体的“模仿”（*mimicry*）中构建一个镜象自我的分裂意识，它从一个主人的“宰制”那学习做一个“宰制的主人”，从典范化的帝国霸权那，“仿制”了“霸权化的典范”。在这种学做主人的过程中，历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和语言霸权（*linguistic hegemony*）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宋国诚2007）。

熟悉马来西亚政治的读者不难发现文本与马来西亚历史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小说中各种鼠类的属性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马来西亚多元社会中的各个族群，例如白老鼠代表着马来精英分子或权贵、贫困单纯的谷地鼠则跟马来平民非常相似、而精于经商的田鼠又跟华人形象相叠合。然而，如此的对号入座并没有太大意义，作家也没有将任何一个鼠群（族群）绝对地神圣化或妖魔化。我们应该更关注的这则寓言故事之中的寓意。小说叙述一群乌合之众为了生存而群起反抗，在取得胜利获得独立

以后，它们又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另一种陷阱，最后以互相厮杀，血流成河收场。伊布拉欣利用鼠辈在建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揭示权力、暴力以及人性的面目，近可反思马来西亚在去殖民之后面对的各种挑战，远则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延伸思考。

故事中的鼠辈在赶走敌人获得自由以后，却逐渐走向另一霸权社会。不满的情绪在鼠辈中日益蔓延。一场热烈的厮杀最终在谷地鼠、白鼠、田鼠和家鼠之间展开，它们都带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信念加入战役，鼠国因而成了一个死城，鼠尸遍野，血流成河。小说最后这一章各种鼠类的冲突与厮杀，俨然是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种族冲突（五一三事件）的写照。虽然这篇小说写于1963年，但作家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族群中心主义的施政、一个群体将其权威强加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等级结构以及社会地位悬殊所将引发的问题。作家的远瞻性让人钦佩之余，也为读者展示了文学如何作为方法，探讨社会政治议题。

《圣鼠》无疑是一个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政治寓言，它浓缩了马来西亚从殖民地到独立建国的历史进程，而权力与暴力则是作家关心的问题。小说结尾处，作者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强者和弱者，那些被奴役、被压迫的也会有报复的行为。在整个寓言结构中，作者把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forest law）终将被时代遗弃的思想化作隐喻主题。然而，这篇小说也有其败笔之处，主要体现于小说的结尾：

幸存的老鼠满怀希望地望向天际，它们祈愿自己的族类可以永远生存下去。然而，它们都确信，苏莱曼先知仍然是它们和谐相处的象征。

（Hassan Ibrahim 2001: 119）

小说最后以先知的超验力量作为拯救力量，似乎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度与现实意义。尽管如此，《圣鼠》还是一篇充满了哲理的警世寓言。以形象思维描绘和分析多元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关系、阶级问题和差异课题。作者对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矛盾提出尖锐又深刻的探问，虽然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他的观察入微以及前瞻性的眼光无疑有着警世的

意味。与此同时，作者十分关心现实的、具体的人性，因此他的思想维度可谓超越了族群、政党和政治论述。在这部小说中，多元社会的政治在此不仅作为一种题材，更是任何多元社会的重要参照。

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殖民与被殖民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但社会的内部矛盾却日益衍生。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一方面急欲与前殖民宗主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却又继承了他的意识形态。例如把异己他者化，他者强置于被殖民者的地位。《圣鼠》这部小说便很好地展示了后殖民社会的这类问题及其（可能的）后果。

另一外马来作家亚都拉胡赛因（Abdullah Hussain）的国族寓言《连环扣》（*Interlok*）也值得关注，其叙事恰好与《圣鼠》反乌托邦的书写完全相反。1967年，国家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为配合马来西亚独立十周年而主办了第三届长篇小说创作比赛。大会规定参赛作品主题思想必须以独立建国、国家发展以及本邦人民生活的奋斗过程为骨干。亚都拉胡赛因凭《连环扣》获得优胜奖（当时首奖与二奖悬空）。这部小说结构恢宏，叙事时间从1900年起始至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为终，涉及了马来西亚三个主要族群（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的历史与生活现状，且给予三个族群人物相当平均的叙述篇幅。有论者认为这部小说内容与轰动世界的美国名著《根》有些相似（陈妙华1994：76）。

由于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这部小说延至1971年才出版。小说前三章各别针对马来民族、华族、印度族的生存境遇作了巨细靡遗的描写。三条主线平行发展，后两者的故事几乎发生于同一时间点上，即20世纪初期中国人和印度人远渡马来亚讨生活。这部小说是一小撮以非马来人作为主要角色的马来小说之一，更可说是本土小说当中采用此手法的先例（Amir Muhammad 2011：45）。

作为一部以建构国族认同为主旨的小说，作家必须突显“我们”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认同心理，因此，在文本前三章各别讲述三个族群的故事之后，作家便将他们放置于反日抗英、反帝反殖这一相同的时空背景下，以进一步描绘他们如何突破隔阂，进而携手争取独立建国的过程。随着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关系也逐步从“我-他”的疏离走向了“我-你”的融合

关系。

在小说最后一章“连环扣”的叙事中，处处浸透着作家对于多元种族促成国族认同的理想。马来评论者指出作者通过《连环扣》牺牲了土著的权力（马来人的权力），以便达成权力共享的理想愿景。这种理想，存在于作家的思想与灵魂中，并通过他的作品而向整个马来西亚社会传播，呼吁大家共建一个新的国族共同体（new national entity）（Syed Mohd Zakir Syed Othman 2011: 235）。这一思想在小说尾声尤其突出，作家借着各个族群的先觉者/领袖之口传达了这一讯息：印度人与华人已然从侨民意识转向本土认同，故乡已成了他乡，当务之急是如何与其他人民合作建构属于全民、不附属任何殖民势力的国家（Abdullah Hussain 2010: 394-397）。

上述言论可说代表了大部分来自三个族群在建国时期的想法，同时也是作家为了解决殖民者（尤其是英殖民）分而治之所导致的族群分裂问题而建构的国族论述。这是作家欲超越殖民和后殖民社会的一种努力，可惜这部小说对社会变迁的观察倾向仍向于结构式的化约和描绘。作家以“马来亚国族”这一新兴的身份认同将长久以来疏离分裂的各族社会链接而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但却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一过程中的协商、对话、矛盾、冲突以及磨合。这也是此作的最大败笔。小说结尾描写华人青年耀成在歼灭马共行动中受重伤而失去半截腿，最后他选择了马来人连同印度人和华人合资送他的义肢，象征着族群关系的融合。各族人物兴高采烈相约到吉隆坡见证国家独立的庆典则寓意着国族认同的基本达成。

作家试图在小说后半部突显出各个族群打破疆界并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然而许多刻意安排的情节反而使作品失去了艺术的真实，同时暴露了作家对于国族建构这一课题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甚至是避重就轻的做法。技术性的安排让文本充满太多完美的“巧合”，例如马来农民穆沙伯救了遇袭的印裔工人玛念、马来青年瑟曼救了杂货店华人老板的女儿宝英、印裔警长拉玛帮助马来妇女莉玛婊脱离日本人的扣押、耀成宝英这对华裔兄妹解救了监狱里的马来青年教师拉晋、宝英在印裔玛念被马共枪毙时及时开枪打死枪手……

亚都拉·胡赛因对于国族建构的过于理想也招致论者的诟病，指作

家的部分描述偏离了真实，甚至创造出“伪造身份”（false Identity）。论者指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所谓团结、平等和同质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一种“伪造身份/认同”，因为在这一社会中，族群对立（ethnic antagonism）仍是显著的，而族群认同也总是优先于国族认同（Syed Mohd Zakir Syed Othman 2011: 241）。事实上，1950年代争取独立期间，虽然各族群对马来亚统一及独立基本上都抱持肯定态度，但不同族群对许多国家政策的根本原则有着极大争议。在一次又一次的协议（bargain）后才完成了建议书，Horowitz将这个阶段协议之下的政策视为一种互惠的君子协定（Donald L. Horowitz 1989: 253）。由此可见，作家虽然努力将各族之间的“我-他”关系转变成“我-你”（我们）关系，用“国族认同”将他们整合起来，然而由于他过于急切地想要呈现理想的结果，却忽略了其中的合理性，甚至回避了一些尖锐课题，以致这部作品只能沦为马来西亚民族融合史的样板。

这类理性主义的国族叙事并非马来文学的独有现象，这一时期的马华作家也在小说中建构了理想中的马来西亚社会。比较起马来长篇小说的丰盛，马华文坛要到战后才开始有一些长篇小说的出版。³ 马崙（梦平）的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同样是以三个族群结构国族叙事。这部小说写于1963年，作者将两对华巫异族情侣的故事放置于马来亚独立前后的背景，借助故事人物谈论摆脱殖民之后的公民性（citizenship）、国族认同问题、族群关系以及国语问题。

在公民性以及国族认同的问题上，作者借助“猪仔兴”这一人物强调南来华人及其后裔的国族认同完全是以本土为本位的（包括抵抗日本兵、儿子参加自卫团），试图打破殖民者塑造的刻板印象——华人在马来亚纯粹为了生计。小说人物也论及被国家承认与接纳对华人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精神意义。实际上，在去殖民以后，这一问题一直是华人的重要诉求。可悲的是，时至今日，这一诉求仍然未获得满足，以致马华文学乃至论述仍充斥着这类主题。在谈及公民问题时，作者复述了马华领袖陈祯禄1952年的言论：我们不容脱离现实，我们必使马来亚成为我们永久的故乡。为我们本身和马来亚着想，我们必须诚心在政治方面和其他民族合作，使成

为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一个政府，安危与共，我们必须成为忠实的华裔马来亚人（马崙1995：130）。

“华裔马来亚人”显然是以国家意识为重的命名与定位，在80年代之后，这一称号开始得到更多关注，谢诗坚曾谈到他于80年代时与林苍祐对于“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称号的争论，后者认为这是过时的用词，我们应该自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这样就能够反映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虽然在字眼上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林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还是带有种族成份，后者则是标签自己源自何处，但已认定是马来西亚人（谢诗坚2015）。9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如王赓武等人）作了更具体的分析，并呼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一词。

显而易见，华人清楚知道国家与政治认同，才是塑造国族一体感的依据。马崙在小说中也做了一次具体实践，小说中借华裔知识青年贵清说出了这番话：

我们这一代光是口头上说推行建国运动和亲善合作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去做到。语文是民族间团结合作的工具，通过文化的交流，各族间将更加谅解。进而促进双方亲善关系。而学习马来语，就是培养团结最实际最妥善的方法。再说，马来亚独立后，马来语的地位一定提高。那时候，学习、使用和发展马来语，便是我们的任务了。

（马崙1995：140-141）

自1950年代起，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生活的需要，华人对马来语文的学习和马来文学的译介相当热烈。当然，华人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自1952年起，华社就一直努力争取华语华文作为官方语，然而，1961年至1964年3月期间，因官方打压与政策，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一度沉寂下来。⁴也许对现实政治以及马来民族主义的认知，让马崙选择以认可而非抵制的姿态来面对马来语。作者的本土认知在作品中则以本土符号（槟榔园、甘榜、多元族群）以及语言（马来语词汇）具体呈

现。作者的“实际行动”就是在行文中选择了音译马来语词汇加上原文词汇附注的方式。

《槟榔花开》以华族青年黄贵清和马来少女玛莉安、马来青年耶谷和华族姑娘紫瑛的爱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可看作是华巫族群关系的一则寓言。不过，两对恋人皆因长久以来的族群藩篱以及小人/极端分子的调拨而没有开花结果。作者对此并非不抱希望，而是认为时机并未成熟，这一阶段应以国家责任为重，而不能因个人的儿女私情而平添民族间的烦扰。且看小说结尾贵清给玛莉安的信件内容：

我认为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异族间的恋爱和结婚，倒不是种族间最合适的桥梁，而信赖、了解、亲睦和合作，才是建国兴邦的因素。……

……由种族和宗教而引起的畛域成见，是上一代的绝大错误。这些常见，不特蒙蔽了人们的理智，兼而伤害到仁民爱物的基本道德观念。在这当儿，凡事应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个人的得失必须放在脑后。……

（马崙1995：230）

上述充满理想主义的言论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在槟榔园中各族和谐共处的场景显然也是作者对于马来亚理想社会的一种投射。不过，就像亚都拉·胡赛《连环扣》因过度理想化而掉入“伪造身份/认同”的建构，论者也指出马崙将这样的理想国当做实在存在了的国家，又用“写实派”的方式来描写，今人看了不免会觉得是在阅读一本“成人童话”的感觉（陈应德1998：163）。如此的家国想象与国族建构只能看作是作家所意图之国族（nation-of-intent）的寄托。马崙后来将小说收入《马崙文集》（1995）时将题目改为《槟榔花开》，也许“后五一三”时代日益巩固族群政治以及越发明显的社会分化，让作者的态度有了转变，槟榔花是否会开、族群关系的改善确实是未知数。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族群关系难以避免地也涉及各种“差异”，不管是在权力、文化、经济、血统等各方面。作家可以借由文学的想象与虚

构为国族认同问题提供各种可能性，甚至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国族共同体（new national identity），将多元融合或和谐共处的理想寄托于作品中。如此的国族关怀确实体现了作家的淑世情怀，不过如果作家的期待过于急切以致略过了争锋或辩证的过程而直达理想目的地，则必将削弱文本的叙事力量与思想深度。正如泰勒所言：“身份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中炮制出来的而是通过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Charles Taylor 1994: 34）

回看现实社会，殖民主义直接激发了本土马来人的民族主义，积极寻求个人、民族以及文化上的属性，作为抵抗的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华族也就成了马来族的反抗对象之一，因为他们也是殖民者引进的外来者，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之一。更甚的是，华人在经济与文化的优势使马来民族担忧华人将成为殖民主义的继承者。

沙侬·阿末（Shanon Ahmad）作于1967年的中篇小说《部长》（*Menteri*）即深刻表现了马来族群长久以来的忧患。小说以一位五十多岁的马来部长巴哈多为核心人物，叙述他对于自身族群所面临的困境、国家前途以及个人政途的种种忧思。作家在小说开端即将两个族群的生存状况通过部长房中的物件作了一番对比——刻上龙图且光灿发亮的碟子与一幅破败渔村景象的油画。两者各别表征了华族的富裕与马来民族的贫困。马来民族作为“土地之子”（son of soil），却过着贫困生活，这是一直困扰部长巴哈多的问题。他的忧虑最终体现于梦境中，他梦见二十年后（1987年）棕色人种的孩子被驱逐至城市边缘，勤于繁殖的龙族占领了城市并不断吞噬着棕色人种的孩子。小说描绘龙族（代表华族）如何威胁棕色人种（代表马来民族）的生存，不仅用了“吃人”的意象，龙族亦被刻画得极为负面，他们头大、嘴阔、塌鼻、长着长尾巴，且性格凶猛，这显然是将华族看作“洪水猛兽”的形象外化。

沙侬·阿末对华人形象的描绘似有妖魔化之嫌，小说乍看之下是批判和指责华族对马来民族造成威胁。然而有一现象值得我们留意，即小说中始终没有出现华族身份的人物，象征华族的只有那个刻着龙图的碟子以及梦中吞噬褐色人种的龙族。华族由始至终作为“不在场的他者”或“想象

的敌人”而存在。马来学者也指出这部小说只呈现了马来角色，尽管其他族群曾在人物对话中出现。不过对于国家的未来，他们并未赋予任何声音或表态（Mohammad Sidik Ariffin 2009: 95）。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真正的敌人是谁？作家真正要抨击的是哪些人？如果没有深入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容易忽略作者的忧患意识，乃至他对于自身族群的反省与批判。

五、余论

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后，作为新兴国家，如何在后殖民情境中生存与发展，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对于不同的殖民/入侵者，各个族裔抱持不同的爱憎态度，而对于如何在殖民的废墟之上重建家园，虽心之所向，却也是各有所思。马来文学界延续40年代对英殖民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与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计划的反弹而持续其反殖斗争精神，而独立前后时期，则表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国族建构的呼吁。林春美指出独立前马华文学作品表现了毫无异议的对马来亚多元族群社会的认同，然而却也无可掩饰地透露了作者集体对本身族群不为即将诞生的共同体所接纳的焦虑（林春美2012: 208）。而独立之后，马华作家仍继续探索这一问题，并热切表达愿意与其他族群携手合作的意愿。

英殖民者“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手法是一种“殖民分类学”的策略，它给马来西亚社会遗留下来的祸害并未随着殖民者的撤退而消散。马来（西）亚自独立至今，族群间的界限以及族群结构性的疏离仍是明显的。无论是马来或马华作家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与反思，他们尝试以多元主义（pluralism）和融合主义（syncretism）回顾历史与打造未来；在异族与故我以及外来者与本土之间游走，以便锻造和形塑新的自我与国族。多元文化是反抗以欧洲为中心的单一文化意识的一种有力武器，这也是后殖民文学常出现的主题（王润华2001: 168）。

马来（西）亚的殖民历史是由各族的殖民遭遇共同结构的，在马来文学或马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跨越种族文化的意象运用，例如

避难所、槟榔园、橡胶园、森林、河流等，这些地方或成为各族人民的庇护所，或是作为承受殖民暴力和屈辱的地方，也可能是群体反抗的基地。

不过，许多作家对于新兴国的想象与国族建构往往只能构成其所意图之国族的精神面貌，强调共同性或一种新的国族共同体之余却忽略了现实中的差异与矛盾，反成了理想主义或乌托邦式的书写。作家似乎也忘了和谐与认同必须通过深层的对话才有可能形成。正如Bruke所说，语艺的符号行动功能就是在于产出“认同化”，也就是形塑出“我群感”的想象概念；而且“认同化”更具有辩证的意涵，因为“认同化”是与“差异”（division）同时存在，语艺的作用就是要克服“差异”，希望“异中求同”，借以协调社会行动（转引曹开明2008：55）。

在国家独立前后，比较起马来作家对于政治与社会的积极探讨，马华作家一方面陷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另一方面，他们对民族课题的关注要比国族问题来得关切。1969年的族群冲突开启了“后五一三”时代，政治与文化皆有了全新局面，文学范式亦受影响。华人在经历70、80年代在政经文教各方面的挫败之后，对于多元社会的矛盾以及国族建构的问题亦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与批判。

族群关系问题，是殖民主义留给马来（西）亚社会最棘手的后遗症。作家尽管不是社会学家，可以给出方法（社会学家也未必办到），但他们可引领读者重新回到历史的原初场景或设想未来情境，甚至让对话的双方/多方相遇。无论是现实社会抑或文学之内，民族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及平等对话的平台必须建立起来。

注释

- 1 “postcolonial”与“post-colonial”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一书中解释：“根据晚近的用法，后殖民（postcolonial）必须要与更为常见的带有连字符号（hyphenated）的概念后一殖民（post-colonial）加以区别，在这部著作中，后一殖民将作为一个分期概念以指称后一二战时代（the post-Second World War era）。”
- 2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简称ASAS 50）于1950年成立，是一群集合马来作家、教师及记者的重要文学团体。他们的努力倾向于文化

- 政治, 尤其注重语文的议题及其与国家独立的关系。其成员积极地拓展马来文学, 将更多本土元素和马来民族色彩溶入文学, 大大丰富了马来文学的内涵。
- 3 根据Ahmad Kamal Abdullah等人编写的《马来文学史》, 1960至1969年间共有238部长篇小说(novel)。详见Ahmad Kamal Abdullah (peny.) 2006. *Sejarah Kesusasteraan Melayu*.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p.542. 马华文坛战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一部, 即林参天的《浓烟》。
 - 4 这段期间, 先后发生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和吊销教师准证的事件, 接着《1961年教育法令》通过, 在威迫利诱下, 54所华文中学接受改制。

参考文献

- 艾勒克·博埃默著, 盛宁、韩敏中译1998。《殖民与后殖民文学》。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 曹开明2008。〈“异中求同”还是“同中存异”: 语艺观点下的“认同化”概念探索〉, 《传播与管理研究》第8卷第1期: 53-84。
- 陈妙华1994。《马来文坛群英》。吉隆坡: 学林书局。
- 陈应德1998。〈梦平文学创作研究〉。载入、戴小华、尤绰韬主编《扎根本土、面向世界: 第一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 高嘉谦2007。〈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载黄锦树《死在南方》。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黄锦树2010年3月14日。〈最后的战役——论金枝芒的〈饥饿〉〉。《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 黄万华1999。《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金枝芒著, 方山编2004。《人民文学家金枝芒抗英战争小说选》。吉隆坡: 21世纪出版社。
- 金枝芒著, 方山编2008。《饥饿》。吉隆坡: 21世纪出版社。
- 李有成2010。〈绪论: 离散与家国想像〉。载李有成、张锦忠主编《离散与家国想像——文学与文化研究集稿》。台北: 允晨文化。
- 林春美2012。〈独立前的《蕉风》与马来亚之国族想像〉。《南方华裔研究杂志》5: 201-208。
- 刘象愚199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马崙著, 云里风主编1995。《马崙文集》。厦门: 鹭江出版社。
- 宋国诚2007。〈本土与后殖民焦虑〉。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2007/08/02/%E6%9C%AC%E5%9C%9F%E5%8C%96%E8%88%87%E5%BE%8C%E6%AE%96%E6%B0%91%E7%84%A6%E6%85%AE/

- 孙振玉2008。《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人及其关系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 陶东风2002。《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润华2001。《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 王岳川2003。〈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传媒话语〉。载张晶主编：《论审美文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谢诗坚2015〈大马华人的称谓〉。<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4369>
- 周伟民、唐玲玲1996。《奥斯曼·阿旺和吴岸比较研究》。吉隆坡：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出版。
- 庄华兴2005年8月9日。〈在历史与文本之间摆荡：论金枝芒的抗英战争小说〉。《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 A. Samad Said 1997. *Sungai Mengalir Lesu*.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Abdullah Hussain 2010. *Interlok*.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n.
- Amir Muhammad 2011. Bagaimana Kita Menggagalkan Interlok. Dalam *Semangkuk Interlok*, disunting oleh Hafiz Hamzah. Matahari. (e-book)
- Charles Taylor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dited by Amy Gutman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nsman (peny.) 1995. *Koleksi Terpilih Sasterawan Negara Usman Awang*.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Donald L. Horowitz 1989. Cause and Consequence in Public Policy Theory: Ethnic Policy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Malaysia. *Policy Sciences*, 22: 249-287.
- Dr. Talib Samat 20.12.2009. Novel Menentang Komunis. *Utusan*.
- Hassan Ibrahim 2001. *Tikus Rahmat*.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Mohammad Sidik Ariffin 2009. Ethnicity in Post-Independence Malaysia in Menteri and in A Far Country: A Thematic Study.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 3: 1-8.
- Usman Awang 1966. *Tulang-tulang Berserakan*. Kuala Lumpur: Pustaka Melayu Baru.
- Usman Awang 1999. *Ini Saya Punya Kerja*.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ions.
- Syed Mohd Zakir Syed Othman 2011. Interlok From a Multiculturalism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Tanja Jonid. *Journal Malay Literature*. Dec: 231-247.